

## 长征故事传播与上海(下)

◆ 朱少伟

1936年11月,著名作家丁玲由沪抵达陕北,担任文艺协理主任,她很快就与成仿吾等一起负责编辑长征回忆录。《文摘》第二卷第二期(卢沟桥浴血抗战特辑)刊载的《集体创作与丁玲》,最早公开介绍了这部长征回忆录的编辑情况:“起初由参加长征的人自由用片断的文字叙述长征中的史实,在几千篇短文中选出几百篇较佳的作品。由这几百篇作品加以淘汰只剩下百余篇佳作,再按历史的次序排列起来乃集成了一部长篇巨著。这部长篇巨著,经过丁玲、成仿吾等人加以剪裁后,始成为现在正式的初稿。”

长征回忆录的编辑工作,至翌年2月才完成,书名定为《二万五千里》。中共中央曾将一部誉清稿本(分成上、中、下三册,用线装订,绿色马兰纸作护封)送到申城(它最终归上海鲁迅纪念馆保管),拟正式出版,但由于抗战全面爆发等原因,此计划暂被搁置(至1942年11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根据另一部誉清稿本付梓,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然而,当年上海却出现了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从江西到陕北》(署名赵文华),这实际就是《二万五千里》摘录本。

2006年10月,《二万五千里》誉清稿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它既清晰展示了誉清稿本原貌,也生动反映了红军将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

## 申城书刊对长征的宣传

在上海,共青团江苏省委创办的《少年真理报》于1936年春首先宣传长征。这份油印报纸从第110期起分7次连载西屏的《中国红军的铁流》。该报每期印1000多份,在团员青年中广为传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满足读者需求,《少年真理报》社于同年9月出版

《中国红军的铁流》小册子,它以手体印刷,收入西屏的《红军的铁流》和李璜的《红军西征是怎么胜利的呢》两篇文章;后一篇文章记录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到1935年6月在川康交界处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历程。这应是上海第一种宣传长征的书籍。

1937年7月,上海人间书屋出版的文史半月刊《逸经》第33、34期,在“当代史料”专栏连载幽谷(即董健吾)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并登出全身军装的“毛泽东像”和“二万五千里西引经过路线图”。这是董健吾根据在陕北看到的《二万五千里》部分原稿编写的,虽仅万字,却记录了长征全过程,时间、地点都交代得很清晰,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有所探讨。为了能够通过“新闻检查”,董健吾将“长征记”改为“西引记”,而且在措词语气上进行了一番伪装。此文首次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宣传长征,引起各界瞩目。仅隔半个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大型期刊《月报》转载此文,并把标题改为《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黄峰编的《八路军行军记·长征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该书编者认为没有长征便没有全面抗战,因而悉心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汇成一册,以纪念长征和介绍陕甘宁边区。该书内容主要分为



西行漫画——草地行军

两部分,一是新闻记者对陕北的采访实录,如长江(即范长江)的《解放了的劳动》;二是长征亲历者的自述,如《雪山行军的插图》和《长征日记》;另外,还有幽谷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和白华译的《红军小史》等。

## 《西行漫画》在沪出版

1937年11月,申城沦陷,阿英(即钱杏邨)坚守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运用历史剧的形式继续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夏,阿英收到萧华辗转送来的20多幅反映红军长征历程的漫画照片,他仔细察看,发觉它们画人个性传神,绘景简约生动。阿英马上意识到,此乃无比珍贵的红军原创作品,既是长征的片断纪录,也是真实的革命史料,如将它们正式

出版,可向世界证明中国抗战必将取得最后胜利。

10月5日,阿英主持的上海风雨书屋经过紧张的编辑和设计,推出了《西行漫画》,因不知道具体作者是谁只好署名萧华。这本画集系32开本,每幅漫画都配生动的短语,如《遵义大捷》有“吴奇伟,吃败仗,老蒋山前叹落荒,惊魂飘渺逃乌江”,《翻越夹金山》有“夹金山,崎岖险径难攀登,红军英雄翻雪山”,《磨青稞》有“过草地前,自己磨青稞麦,磨子虽小,一天一夜可以磨三十多斤”。

与此同时,上海出版的《大美画报》(由赵家璧主编)也在第二卷第一期刊载部分漫画照片,并在“编辑的附言”中说:“西行漫画,得在本书出版前在本报先行发表,是我们一件很光荣的事情。这里所选七幅,可以说是全部作品中最精彩的代表作……证明用中国画法所作的漫画,不但在技术上超越了洋画,并且葆有了中国国画中独有的风韵。”

当年,《西行漫画》共印2000册,其中精印本(铜版纸)500册、普及本(道林纸)1500册。它们很快就销售一空,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后来,阿英从上海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他在访问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时得知,画集作者署名可能有误,便在1943年6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得悉萧华同志不会画,前在沪,余所刊《西行漫画》,实为中央红军宣传部人所画。”

解放后,《西行漫画》更名《长征画集》重新出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黄镇曾回忆:“1961年,我从国外回来不久,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一位同志前来访问,向我征询《西行漫画》的作者。这是1938年由战斗在上海孤岛的阿英同志编辑出版的一本关于长征题材的画集,作者署名为萧华同志。可是,1958年再版的时候,请萧华同志为重印本写序,才知道是初版的误记。是他把画稿托人辗转带到上海去的,至于画的作者,连他也记不清了。”那时,黄镇看到《西行漫画》第一页的《林伯渠同志》,就激动不已:长征中,这位老同志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不管白天或黑夜,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执着手杖,雄赳赳地走在红军队伍里。他“一页页翻下去,好像又走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的行程”。于是,这本画册的作者之谜终于解开:黄镇参加长征时在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承担着繁重的宣传任务,但沿途火热的战斗生活、独特的民间风情,促使这位曾就读于上海美专的艺术家忙中抽闲“画了整整一作了”,他用随手拾来的杂纸陆续创作了四百多幅鼓舞士气的漫画。黄镇夫人朱霖曾回忆:“过草地时,黄镇脚上已经没有鞋了。他就用拣来的一张破鼓皮,做了一双鞋,用麻绳绑在脚上。破鼓皮很硬,很快就脚磨破了,草地的毒水一泡,就红肿起来,伤口溃烂……黄镇一下子也走不了路,是让人抬到了哈达铺。他的画,也就画到这里。”因行军和流动不定,黄镇的作品最终散失,但其中的20多幅被人拍成照片保存了下来。

摘自《浦江纵横》2016年第8期

## 傅海澜传

董煜



本书是国内首部从亲情角度切入解读司徒雷登和傅氏家族关系的纪实文学,作品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客观真实的司徒雷登,令人信服地剖析了处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传主的人物心迹。

## 1.工作人员一脸困惑

9月19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每年的9月19日,都会发生些事情: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阿根廷总统庇隆被推翻……

2014年的9月19日,一位83岁的老人,在几位朋友的陪伴下,悄悄地来到杭州半山安贤陵园。几天前,她不顾年老体衰,横跨北冰洋,从一万多公里外的华盛顿来到这个江南水乡,就是为了这个日子。1962年的9月19日,她的司徒爷爷在华盛顿去世,52年后的9月19日,在司徒爷爷的忌日,傅海澜想再一次见见她的司徒爷爷。

天下着雨,秋天的雨,有些凉了。不是清明节的安贤园,静静的,空无一人。沿着步行道往前,都是风景,溪水潺潺,一路追随,各种各样的树,形态各异,在雨水的滋润下,恣意地生长。

司徒爷爷一如既往地微笑着,在墓碑上。在与司徒爷爷朝夕相处的那些年里,傅海澜知道司徒爷爷对中国一往情深,现在,爷爷终于回到了他挚爱的中国,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他的笑,应该是欣慰的吧。

她上前,轻轻地抹去墓碑上的雨水。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对司徒爷爷一生的定位——司徒雷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是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教育家,才是司徒爷爷的本来自目。她有点困难地弯下腰,把一只小花篮放在爷爷的墓前。几支香水百合静悄悄地盛开着,洁白圣洁,香气四溢。

为她领路的陵园工作人员站在一边,他有点不解地看着这一切,看着这个来为美国老人上坟的中国老太太。他好奇地问傅海澜身边的朋友:“她是司徒雷登的什么人哪?”“孙女。”有人告诉他。“孙女?”那工作人员一

脸困惑。

一起来墓前瞻仰司徒先生的几位,先后在墓前鞠躬之后,鱼贯离去,任凭那工作人员傻傻地站着。没人给他解释,也没法解释。要想说清楚傅海澜跟司徒雷登的关系,就得从话说起,从傅海澜的父亲傅泾波说起……

在北京西城王府仓靠近城墙的那头,曾有一座“镇国公府”。这是一栋有七十余间房的巨宅,雕梁画栋,十分巍峨。这里的主人富察倭和(倭和的满文意思是巨石),属满洲正红旗,因为镇守边关战功显赫,被封为“镇国公”。富察氏是女真最古老的姓氏,满族八大家族之一。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富察氏却经历了四朝天子仍旧荣宠不绝,他们与清朝同起、同兴、同衰、同败,就像一面镜子,浓缩了整个王朝的发展史。

镇国公的先祖是最早随多尔衮进京的,八旗入关后,正黄、镶黄二旗被安置在北城,正红、镶红二旗被安置在西城,正白、镶白二旗被安置在东城,正蓝、镶蓝二旗被安置在南城。由长白山移居京城后,在西城锦市坊街王府仓胡同,正红旗的子孙在那里定居了十二代之久。

富察倭和自幼受传统私塾教育,成年后通过科举殿试以武进士入仕,被派任京都门户通州协台(文职为道台,武职为协台)约10年之久。其后升任山海关总兵。富察倭和精通满、汉文,骑术武功也同样出色,闲暇时他会亲自传授晚辈满文及汉文辞赋。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富察倭和回京闭门思过,在李鸿章三顾茅庐的劝服下重新复出,因剿灭义和团有功,御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1903年秋,富察倭和转至甘肃书州上任,任职8年后由甘肃离职返乡。因在任上克勤克俭、两袖清风,离任时当地商民依依不舍、含泪相送。富察倭和离职后过着平静简朴的生活,1920年去世,以“建威大将军”的封号葬于北京西郊西平庄祖坟。

富察倭和有五男二女,但仅有次子为他添了男丁。全家上下对这个长孙宠爱有加,因为他替富察家族延续了香火,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个长孙日后还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个“镇国公”的长孙就是傅泾波,傅海澜的父亲。

## 19.为啥叫同和里

晚上毛头的阿爸在床上唉声叹气,毛头妈妈问他怎么啦,他说:“运气不好,第一盘下了局和棋,以后连输九盘。剩下一分钱,不甘心这么早就回家,想下得慢一点,稳一点,说不定能下盘和棋,谁知道又输了,只好回来拿一分钱送过去给老板。懊恼啊!”

刚才在棋摊上,毛头的阿爸被一个白胡子老头连杀了十盘光头,输了两角钱,还被白胡子老头搭着肩膀一路开导回来。白胡子老头说:“小阿弟,下象棋这个事情,我看你是慧根全无,修为尚浅,悟性太差。不是我看轻你,象棋方面,你基本不会有什么长进的。要是想消磨时光,尽可以去找邻舍隔壁厂里同事做搭子,解解闷可以了,何必跑到棋摊来替人付钞票呢?你心不疼钞票,你老婆知道了不心疼?不要小看了两分铜钿,一次两分,十次就是两角,一个月下来也不是笔小数目。你一个月能够赚几钿?你这件衬衫领头还翻了个面,袖口还贴了块布,脚上这双旧皮鞋至少三个礼拜没有上过皮鞋油,看你也不是赚大钞票的人。穷人家呀,要穷打算。”此时走到北京西路成都北路路口,白胡子老头住在国际饭店后面的黄河路,要穿马路了,拍了拍毛头阿爸的肩胛,又说了几句算是临别赠言,“你要是真的舍得花钞票,就到书场去,泡壶碧螺春,听听苏州评话,多少乐趣。富春楼沧州书场、仙乐书场、西藏书场就在这附近。习惯了,一天不去就浑身痒痒,搔出血来也没有用,还是痒。”

毛头的阿爸输了棋子本来就不开心,莫名其妙又被白胡子老头教训了半天,更加不开心,闷头闷脑回到家里,一肚皮火没有地方发,正好听到毛头在叫,“刚刚我从家里逃出去了!”撩起就是一记耳光,扇得毛头七荤八素。毛头的阿爸叫毛头跪在洗衣裳搓板上,手里再举一只实木的宁波矮脚凳,这样教训儿子比较省力,效果也好,省得几记耳光打下来,自己的手也容易别筋。毛头的阿爸说:“无法无天,小鬼造反了。今朝你敢逃,明朝你就要去偷,后天你就杀人了。讲,下趟还逃吗?”用不着他问第二声,毛头已经讨饶了,说不逃了。

毛头的阿爸比较差劲,小皮匠从来就不

会这样拷问。每次我逃走以后回到家里,小皮匠总是一边挥槌头一边讲:“怎么又家来了?我请过你家来了?你逃出去不家来才好呢,还能帮我省点粮票钞票。你要是有志气,你下回就还逃,逃了就不要再来家。”同样是当爸爸的,境界完全不一样。

回过头来说说同和里,因为这和接下来的故事发展有关系。我们这条弄堂冗长而又乏味,整条弄堂的造型就像一根完整的鱼骨头,两边是无数的夹弄,从东到西两头是通的。要是你视力足够好,要是中间没有遮挡,你站在前弄堂小皮匠的皮匠摊边上,可以看到后弄堂摆裁缝摊的女人在为一个长脚女人量腰身。

据说同和里一开始不叫同和里。弄堂口青砖砌成的拱门上镶嵌着花岗岩,上面雕的魏碑立体字,是同昌里。那时候的房产商不会这边刚刚在打桩子,那边已经开始收钞票卖了,要卖也要等房子全部造好了再卖。来的第一个客户是个绍兴人。一问价格,十条大黄鱼可以买一

幢石库门。大黄鱼是指十两一根的金条,你要是真的从菜场里拎一串大黄鱼去买房子,是要被人打断脚骨的。绍兴人去闯滩,也不讨价还价,摸出九十根大黄鱼,一口气买了后弄堂笃底九幢房子。三幢房子给大小老婆一人一幢,另外六幢给了六个儿子。绍兴人在三个老婆那里轮流住,估计是像皇帝一样翻牌子的。绍兴人买房子买得爽快,不过过了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把“同昌里”改名为“同和里”;另外,将来弄堂口必须左面摆一个剃头摊,右面摆一个皮匠摊,不能摆其他的摊头。问他为什么,绍兴老倌不解释,都觉得绍兴老倌有点神经兮兮。后面一个要求办到不难,但弄堂名不是说改就能改的,这是在工部局里备过案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后来居然办成了。于是喊来石匠,把同昌里凿掉,在花岗岩上重新凿了三个字:

同和里。原来三个字是凸出来的,现在三个字是凹进去的,在凹进去的地方刷上红漆,倒也照样弹眼落睛。要是谁有心考察一番,会发现,全上海的弄堂的拱门上面,弄堂名字清一色是朝外凸的,只有同和里是瘪进去的。

## 同和里



王立志